

第一章

成長啟蒙



五四健將羅家倫傳



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中國，正處於內外交困，水深火熱之中。甲午戰爭後，俄國聯合法、德進行干涉，迫日本歸還遼東半島，打著「共同防日」的幌子，居功向清廷索酬。一八九六年（光緒二十二年），清廷以李鴻章為「欽差頭等出使大臣」於是年六月在莫斯科同俄國簽訂《中俄密約》，規定中、俄「共同防御」日本，中國允許俄在東北修鐵路、開礦山，俄艦可駛入中國沿海各港口，俄租借膠州灣為軍港。據此，東北遂成俄國之勢力範圍。《中俄密約》一訂，西方列強乃聞風而動，紛紛染指，掀起宰割中國之狂潮。

羅家倫曾以《詩經·小雅》中《蓼莪》一詩作其憶念慈親的詩集名。面對「拊我畜我，長我育我，顧我復我，出入腹我」的哀哀父母，兒女那創痛劇烈之呼喊與痛哭——「無父何怙？無母何恃？出則銜恤，入則靡至。」「鮮民之生，不如死之久矣！」——讀之令人泣下。生於十九世紀末之中國的羅家倫，他的祖國，正像一個被侮辱被欺凌而哀哀欲絕的母親。「蓼莪誰所興，念之令人老」，《蓼莪》泣血之音，亦若家國之痛，正彷彿羅氏此輩人生使命之由出。

童年生活

羅家倫，字志希，筆名毅。原籍浙江上虞，清雍正年間五世祖漢文公始遷居山陰，著籍紹興。父傳珍公，字沛卿，四十歲後更號鈍庵，晚年署鈍翁。早年遊幕江西，清末及民初，為政於江西諸縣。羅家倫生於公元一八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（清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冬至日）。羅家

1 關於羅家倫一出生地，筆者所見資料中有兩種說法。呂芳上、夏文俊的《羅家倫先生大事年表》、陳春生的《新文化的旗手——羅家倫傳》

倫的童年時代在南昌度過，到十六歲時才回到紹興，但只待了兩年，便到上海去讀書，所以他的紹興鄉土意識甚為淡薄。正是羅家倫出生之年，十一月，德國占膠州灣；十二月，俄國以膠州灣被德所據，乃另行強占旅順、大連；此後，法、英、日、美接踵而至。

多年後，飽經憂患的羅家倫於《蓼莪集》中回憶少小受教於雙親，嚴父慈母，舐犢情深，謂「三歲至九歲期間，留印象於我腦海最深之事。嗟夫！此簡短一段之兒時生命，實吾畢生最幸福之時期。」三歲至九歲，在一生當中，實屬短暫。因羅母在家倫九歲這年亡故，予他以「生命上最初亦最慘痛之創痕」。所以此前依偎母愛的時光格外甜美。而念及此輩之生於憂患，除了少不更世時得以免懷，亦無怪一生之中更難有孩童時代那般幸福甜美的記憶。

羅母周氏，名霞裳，字瓊仙，具文采。羅家倫的童年，在慈母的關愛中受到良好的啟蒙。「三歲時，吾母置我於膝上，教以識字，並背誦短詩；入家塾後，晚間則於素油燈前為我溫課；晨起理我髮而總我角，夜寐吻我額而催我眠。吾父鈍庵公有時督責稍嚴。母則濟之以寬；余因頑劣受侮時，母常戒之以格言，感之以溫淚。」《蓼莪集》中留著羅家倫對這樣一位溫良慈愛之母永遠的印象，更記述了幼年喪母給他留下的至深創痛：「猶憶吾母於臨終之際，示意余趨榻前，已不能言，惟淚奪眶出。余跪母前搶地哀呼，知吾母自此棄我而去矣！吾母最後之一淚滴，即平日滴進我心坎中之溫淚也！哀哉！哀哉！」羅母死之年，羅家倫才九歲。時隔二十七年之後，即一九三二年，羅家倫

等一些資料中說羅家倫出生於江西南昌，而收錄於《羅家倫先生文存》第十冊，第二〇八—二一二頁的《自傳》後所附《行述》中稱「先生以民元前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生於紹興，隨侍入贛……」云云。劉維開的《羅家倫先生年譜》，資料翔實，但關於羅氏的出生地卻未曾寫明。

時任中央大學校長，母親忌日那天，「公畢踉蹌歸，設家祭後，悲感交集，困頓萬狀，仰天飲泣。於淚眼模糊中，忽覺吾母音容宛然在望，兒時光景，掠過如飛。母乎！母乎！兒雖長成，屢經世途之艱險而未稍餒；然亦逢痛苦無告之時，益感惟親切偉大之母愛，方能療我在人世間之創痛，而今已矣！」此時的羅氏已人到中年，在這段內心深處的文字裡，對母愛偉大之感和念和人生多艱之感懷無由得分。¹

羅父傳珍公為清末名幕，工書畫，精篆刻，風雅之士；為政則清廉勤政，頗有政聲。羅家倫為其父作《羅鈍庵先生行述》記云：「公以誠篤勤敏之特性，而擅文藻，……公由佐縣政而參省政，於清季及民國初年，數長進賢、萬年、都昌、奉新等縣，每權一縣，以改良農業，興修水利，增進農村副業，而裕民生為首務，更及於教育，凡所治之縣，小學必有所增；嚴禁溺女惡俗，遇則重懲，於交通則數創義渡制，乃因江南多水，每遇興辦一事，必先捐俸以為倡之。常曰：此不盡予民眾以鼓勵，且所以堅其信心也。而公以清廉多才之身，又好創舉新事業，於是每逢卸任，輒負債累累，他人以為利者，在公則為債臺，終公之生，均為債所累，而公處之泰然。常告子女曰：平生不要造孽錢，故窮係我本分。」²羅家倫有詩記乃父清廉自持之風：

老人自號信天翁，

1 參見羅家倫：《夢莪集》，《羅家倫先生文存》（以下皆簡稱《文存》）第九冊，詩歌，臺灣，羅家倫先生文存編輯委員會編，臺北，國史館，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一九八九版。

2 羅家倫：《羅鈍庵先生行述》，《文存》第十冊，記傳，第五五頁。

羞與人間雞鶩同。
更笑鷹鷂貪得飽，
蕭然雙袖拂清風。

傳珍公在進賢時，曾捐俸購麻種萬斤，分散民間，教其種植，並設夏布廠以為示範。二十年以後，傳珍公寓南昌，羅家倫由歐美返國，見家中有新織細夏布數匹，詢其由來，傳珍公笑曰：「此進賢民眾所贈。」原來百姓一直感念傳珍公德惠，幾經探詢，得其寓址，送來這些布匹。羅家倫詩記其事：

頻捐清俸助栽麻，
謂勝河陽一縣花。
事閱廿年來匹素，
老農贈與舊官家。

羅父為清朝官吏，但同情國民革命。《羅鈍庵先生行述》中記有傳珍公在江西撫署軍政參事任上時，曾「徹夜不眠，繞室彷徨，乃為疏解革命先烈彭克儉之獄，並營救黨人之牽連者。時贛撫馮

汝驥已允從寬，而布政使劉春霖頑梗，致未克盡如所期，但李烈鈞諸先生竟得免禍。」¹《蓼莪集》中有詩記云：

為寬黨獄幾瀕危，
深夜移文代析疑。
嗣見功成終不道，
一生謙附黨人碑。

母親死前，有嚴父督責亦有慈母感化。雖慈母早逝，但父親對羅家倫憐愛有加，悉心教導。「晨起，猶未早餐，必盤旋父榻之前或跪榻几，或坐小凳上，以聽父講授歷史中先民之故事，凡此典故，均由吾父加以選擇，認為有興趣而且富於教育意義者，先於夜間錄入小冊；講授既畢，即以此小冊付余複習；日恒二三則，如是者數年。」²而父親對他的教育，有舊學，有新知。「當時風氣初開，凡滬上有關新知之課本或書報，父常盡先囑托友人購寄，供余參閱。察余略有進益，父必盡去威嚴，以慈祥之態度，加以慰勉。」³鄒容的《革命軍》於時乃為清廷禁書，傳珍公因任江西撫署軍政參事故得閱。而傳珍公袖藏《革命軍》交羅家倫閱讀，始成羅家倫嚮往革命之意的最初萌動。「某晚

1 羅家倫：《羅鈍庵先生行述》，《文存》第十冊，記傳，第五六頁。

2 羅家倫：《蓼莪集》，《文存》第九冊，詩歌。

3 羅家倫：《蓼莪集》，《文存》第九冊，詩歌。

公歸，於袖中出鄒容《革命軍》一書示余，余讀之狂喜，革命思想遂以勃興。¹可見傳珍公開明思想之一斑。傳珍公為傳統士大夫中深識篤行之輩。《羅鈍庵先生行述》記云：「公初好宋明理學，於宋則兼涉朱、陸，於明則酷好陽明，務期於力行中求體驗。晚年尤推重明季諸鄉賢，如劉戡山、黃梨洲輩之著述。故於性理之學外，且及其民族觀念。常手鈔劉戡山人譜一書，以教家倫，且囑余讀黃梨洲《明夷待訪錄》諸書。清季國粹學報社收集明遺民張蒼水等佚著重印，每出版公必百計購閱。」²羅家倫詩記曰：

大袖藏歸《革命軍》，

教兒讀罷氣如雲。

鄉賢歷歷頻頻數，

惟贊黃劉不朽文。³

羅家倫自述傳珍公對他這些啟蒙教育的重要：「適為中國新舊教育過渡期間，故一方面背誦經籍，一方面講授地理歷史諸教科書。如今日列入大學叢書之夏曾佑先生所著《中國古代史》，乃當年高小歷史教科書也。公復授以顧祖禹《讀史方輿記要》，及顧亭林《天下郡國利病書》，蓋以經

1 羅家倫：《羅鈍庵先生行述》，《文存》第十冊，記傳，第五六頁。

2 羅家倫：《羅鈍庵先生行述》，《文存》第十冊，記傳，第五五—五六頁。

3 羅家倫：《夢莪集》，《文存》第九冊，詩歌。

世之學相勉焉。家倫以後受正式學校教育，略有寸進者，於童時得益於公之庭訓者多矣。」¹傳珍公的開明教育，新舊並進是一方面，而傳珍公之作為傳統士人中重經世之學的言傳身教，對羅家倫日後的生命事業多有垂範作用。在羅家倫對父親的回憶以及他作《羅鈍庵先生行述》時所著意強調者，諸如民族觀念，家國之痛，如裕民生，興教育，經世之志，重為政事功之類，都是羅氏日後生命中著跡之事。尤羅家倫謂其父之「好創舉新事業」，真可作為他本人生命的一般寫照。

復旦公學

一九一一年，羅家倫十五歲，入南昌美國教士高福綏（F. C. Gale）的英文夜校學習外文。此時他亦注意上海的招生廣告，準備投考。一九一四年，羅家倫十八歲，入上海復旦公學就讀。復旦公學即今日復旦大學之前身。復旦公學的前身是震旦學院。震旦和復旦都是近代著名教育家馬相伯先生創立的。「震旦」即佛經中所謂「中國」；又八卦「震」表東方，「旦」象形為太陽在地平線升起；拉丁語的「東方」，英、法文校名 Aurora, L'Aurore 均然，震旦意謂中華曙光。馬相伯先生信教，是法國教會的神職人員，但他想要出資辦的，是一所具有歐洲大學、研究院（Akademie）性質的學校，並特別把不涉教理列入學校章程。馬相伯的辦學理念引起了教會的不滿，學院開設一年多後，天主教會意欲奪權，盡廢舊章，引起學生強烈憤慨。一九〇五年初，震旦學生集體退學，馬相伯也毅然退出震旦。復旦公學的成立，即由原震旦學院部分師生馬相伯、于右任等創辦。「復旦」

1 羅家倫：《羅鈍庵先生行述》，《文存》第十冊，記傳，第五六—五七頁。

二字選自《尚書大傳·虞夏傳》之「日月光華，旦復旦兮」，意在自強不息，也暗含恢復震旦和復旦中華之意。

由於于右任等人的關係，復旦公學與國民黨有比較密切的關係。一九一三年校董改組時，孫中山曾被推為校董會主席。羅家倫就讀於復旦公學期間，初識黃興、戴季陶等人，而黃季陸、吳南軒等則是他當年的同班同學。復旦公學在當時很有言論自由的精神，因而復旦學生的政治興趣也較其他學校濃厚。羅家倫在復旦公學期間表現活躍。復旦公學時期的羅家倫不只學業優異，因其舊學基礎好，常下筆千言，被同學戲稱為「老夫子」。那時候大家年紀尚小，稱他作「老夫子」，原是有點諷刺的意味，可羅家倫竟誇大地說，他是「孔夫子」而不是「老夫子」，不料後來叫他作「孔夫子」的人也多起來了，羅頗引為得意。他在復旦公學的同班同學黃季陸回憶羅家倫當年的一些小事，對羅家倫大言不慚的形狀多有揶揄，甚可見其個人性情的一面。除此之外，羅家倫還任《復旦雜誌》編輯，開始運用文字發表他的理念，他曾撰文與同輩的青少年朋友共勉：若欲以二十世紀國家的主人翁自恃，必須有春日載陽、萬象昭蘇之慨；切莫暮氣沉沉，氣息奄奄。一定要努力成為「新學生」，切莫淪為「陳死人」。此時已經顯露出羅家倫頗具有鼓動的熱情和才幹。

中學時代，羅家倫最崇拜君憲派的梁啟超。君憲派視革命黨人為袍、土、革（袍哥黨、土匪、革命黨的三結合）的暴徒，因此不但思想上針鋒相對，甚至情緒上兩派也頗不相能，所以在學校裡，革命黨與君憲派經常一言不合就吵起架來，甚至動上拳腳。羅家倫不喜私鬥，遇此情形，每每讓步，

1 羅家倫對早年生活的回憶中，多有與國民黨人最初如何結識的記述。由於羅氏後來成為堅定的國民黨人，這種有選擇的對淵源的反覆書寫不足為怪。讀者自當明鑑。

很多人以為羅家倫不過是個文弱書生，是個膽小鬼。他的同學黃季陸回憶裡便說自己對羅家倫如此印象綿延多年，直到後來才認識到羅家倫真正勇敢的地方，盛讚羅家倫勇於公義、怯於私鬥。羅家倫逝後，沈剛伯在回憶文章裡有一段總結性的話，似亦可印證於此。其中說到「他通權達變，偶亦出入小德，而在重要關頭，確有臨大節而不可奪的操守」¹。羅家倫大約在小節上並不是十分拘束嚴謹之人，在他生命的各個時期，以及在他身邊各種不同的人的回憶裡，對他的冷嘲熱諷，從善意的到尖刻的，著實不少。所謂「出入小德」當是持平之論。至於「勇於公義、怯於私鬥」和「臨大節而不可奪的操守」，也是事實所證，所以那些看到他性格矛盾面的人才為之折服和感慨，此乃後話。

羅家倫作為北大学生幾乎世人皆知，而他與復旦公學的這層關係卻相對很少有人提及。對此，他在復旦公學的同班同學黃季陸在後來的回憶文章裡還諷刺過他。黃季陸回憶說，他和羅家倫自民國六年（一九一七）在復旦公學畢業後，羅家倫考上了北大，五四運動之後，更成了一時的風雲人物。而此時黃季陸遠在日本，羅家倫每給黃寫信，言必稱我們北大如何如何，而從不提他是復旦出身。可是北伐之後，許多復旦師大出任國民政府要職，像于右任、邵力子、葉楚傖等。這時候，羅家倫又言必稱復旦，說我的老師于右任，我的老師葉楚傖，我的同學黃季陸……於是，黃季陸就揶揄他說：「你從前在北大的時候就忘了復旦，現在你只曉得復旦而忘了北大！」²

1 沈剛伯：《悼念羅志希先生》，臺灣，《中外雜誌》第七卷，第三期，轉引自《羅家倫傳記資料》，臺北，天一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。

2 黃季陸：《勇於公義怯於私鬥的羅志希先生》，臺灣，《傳記文學》第三十卷，第一期，轉引自《羅家倫傳記資料》。

日後羅家倫留在歷史上的，是五四旗手、新文化運動健將這樣一種幾乎符號化的印象。毋庸置疑，他是白話文、新詩甚至簡化字熱情的倡導者、實踐者。待重新檢視其生命，則應該看到其生命中舊學滋養十分深厚。他為父親所作的行述念茲在茲加以強調的，與其說是父親的人生，不如說是父親予他的傳承。在這一部分記述中，似乎看不到新舊學之間的抵牾，而是自然而然的融會。羅家倫一生保持著寫作舊體詩的習慣。在《羅家倫先生文存》中，匯集起來，他的舊體詩數目甚巨。沈剛伯在回憶羅家倫時，特別說到羅家倫身上種種矛盾性格的自然調和，其中之一便是這種新舊文化的自然並存：「他一向唾棄文言文，而偏愛做舊詩，其絕句佳者幾可與龔定盒相頡頏。凡此種種皆極難調和的性格與作風，而志希先生卻俱有之，表現得非常的自然與成功。」¹羅在《心景遊蹤集》序言中謙稱：「雖然持鋼筆作白話詩文如余者，曷足以言舊詩，此不過余之野狐禪而已。」²並解釋說：「余無意僭居雅壇之一席地，尤冀賢達毋因此而置牯於極待拓展之新詩無量前途。」²一九五三年他為紀念胡適六十二歲生日寫了一首白話詩。據羅氏之女久芳說，此時的羅家倫早已不常寫白話詩，贈送個人的白話詩更是絕無僅有。這首詩裡面，羅家倫寫有兩句：「請你不要罵我用古文的濫調，真是：和而不同強哉矯。」他們一向是新文化運動志同道合的鬥士，羅家倫在這個小小的地方對胡適這麼一解釋，殊為有趣。從羅家倫的舊體詩看，記事，則家事國事天下事；記遊，則四面八方海內海外；抒情，從兒女情長到感時傷懷，內容包羅萬象，無所不至。他生活世界遭逢

1 沈剛伯：《悼念羅志希先生》，臺灣，《中外雜誌》第七卷，第三期，轉引自《羅家倫傳記資料》。

2 羅家倫：《心影遊蹤集》，《文存》第九冊，詩歌。

的一切，無不可以入詩。他習慣用來記述生命，抒發情感，自然而出，無拘無束的，居然是舊體詩。亦可知舊學在五四一輩新人生命中印痕之深。作為中國新文化運動弄潮兒之一，這實在是很有趣頗堪回味的的事情。舊學對五四一代新人潛移默化的滋養和影響，或許正是某種得天獨厚的，造就他們生命特質之底蘊。這種因素隱而不發，更且因為他們公然、熱烈地反對這些其實深潛、蘊藏在他們生命中的東西，歷史常常就忽略甚至刻意抹掉了舊學在這代人身上的獨特印記。一旦他們熱烈地反對真的成功了、實現了，當後來的人完全離棄了他們熱烈反對的那些東西時，五四一代人身上的那種特質卻奇怪地消失了。那一代人是獨特的，卻可以肯定，這種獨特絕不僅僅是純粹由新文化運動所賜。

至於對五四進行決然兩分的方式，余英時已有糾偏之論，這也可見諸羅家倫一生的文化追求：「文化折衷論自然比『全盤西化』或『全盤本土化』麻煩得多，更不及後兩種方式來得乾脆痛快。但二十世紀的中國經驗卻清楚地告訴我們：在社會大轉變時代，文化認同並沒有捷徑可循，無論是個人還是民族集體，都必須在長期嘗試和不斷調整的過程中才能找到適當的方向。所謂『全盤西化』或『全盤本土化』都只能是少數人的主觀想像，可以成為理論上的『理想型』或『模式』，但在現實生活中決無可能出現。以常態情形而言，文化認同必然是在實際生活中逐漸發展和形成的，其間本土的成分和外來的成分互為作用，保守和創新也相反相成，折衷是無可避免的結局。即使是過去的『全盤西化』論者，儘管反對『折衷』，也未嘗不承認這一事實。」¹

1 余英時：《中國現代的文化危機與民主認同》，《現代危機與思想人物》，北京，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二〇〇五年版，第四二頁。